

# 伦理何以“还乡”

## ——从“乡愁”的哲学表达谈起

王露璐

**〔摘要〕** 乡愁的哲学表达主要体现乡愁的主体、乡愁的对象和乡愁的根源,在不同学者对乡愁的释义或相关表达中,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复原与重建、渴望与批判等,都呈现出乡愁根源的冲突性特质及其与乡愁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20 世纪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遭遇的同质化倾向,是导致文化乡愁成为现代性主要特征之一的重要原因。根植于乡村生活尤其是乡村人际关系、空间载体和道德生活记忆的乡愁,包含恋土、怀旧、思乡的复杂情感,兼具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成为一种隐喻着城乡关系和农民身份认同的“现代性的中国话语”。“记住乡愁”充分彰显了乡村振兴背景中伦理“还乡”的价值旨归,伦理“还乡”需要通过乡愁实践的伦理“嵌入”,为“记住乡愁”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乡愁;伦理“还乡”;“记住乡愁”;乡村振兴

乡愁是一个多元而复杂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和话语体系中有着不同的指向和内涵。缘于此,关于乡愁的文学表达和理论探究,也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基于对中国乡村文化、城乡关系等视角的乡愁研究,也日趋成为国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13 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镇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城镇建设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sup>①</sup>,进一步引发了学术层面和实践层面关于乡愁的关注和探讨。“记住乡愁”是对“乡愁”这一中国传统文化术语的传承和转换,既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伦理重建提供了道德文化之“根”,亦可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表达。

### 一、乡愁何谓:多学科视野中的乡愁及其伦理蕴涵

从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说,乡愁意为思念家乡的忧伤心情。在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话语和现实语境中,乡愁有着复杂的词义。

王露璐,法学博士,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乡村文化振兴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23)。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乡村道德的实证研究和地图平台建设”(21&ZD0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 GIS 的中国乡村道德地图研究”(21BZX019)和江苏省第五期“333 工程”科研资助项目“强富美高新江苏进程中的乡村伦理研究”(BRA2020061)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 年 12 月 15 日,第 1 版。

在英文表达中,“乡愁”(nostalgia)是希腊语单词 nostos(回家)和 algos(痛苦)的合成词。1688年,瑞士医生约翰尼斯·霍弗(Johannes Hofer)发表了一篇医学论文,用“乡愁”一词描述瑞士雇佣军在远离祖国的战场上表现出的一种极度思乡的状态,患者的症状是沮丧、忧郁、情绪不稳定,包括反复哭泣、厌食、全身消瘦,还常常产生自杀倾向。在此后大约200年里,乡愁都被作为一个医学术语。

19世纪,乡愁开始从临床内涵转向象征意义,表现为对失去的地方或消逝的时光之渴望。这一时期,欧洲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带来的时间加速感和重寻以往生活的欲望,助长了现代乡愁的孕育,也引发20世纪60—70年代“文化乡愁”的兴起。其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关于乡愁问题的讨论最为热烈。事实上,正如奥利维娅·昂热和戴维·伯纳在《人类学与乡愁》中所提出的,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创立是建立在一个充满乡愁的现代性概念之上的,涂尔干、韦伯、滕尼斯和齐美尔的理论包括了对新兴西方工业社会的批判立场,其框架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道德对立。戴维·伯纳将人类学家对学科的乡愁之情称为“外部的乡愁”(exo-nostalgia),即对他人(文化)失落的感受和话语,认为这种乡愁情绪是基于传统社会的脆弱性和殖民主义的影响,并且,这种姿态一直延续到今天。例如,人类学家们最喜欢的一些人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贫穷的人,而不是全球的、多样化的和占主导地位的人,这种态度正是根植于他们对学科“外部的乡愁”之情。<sup>①</sup>卡森认为,乡愁与其说是对故土的怀念,毋宁说是对母语的眷恋。<sup>②</sup>

戴维斯将乡愁分为“简朴的乡愁”“自反的乡愁”“阐释的乡愁”三个阶段。“简朴的乡愁”是一种主观状态,它承载着这样一种未经检验的信念,即过去比现在更好(更美丽、更健康、更幸福、更文明、更令人兴奋),简言之,“过去是美丽的而现在丑陋的”。“自反的乡愁”阶段,人们唤起情感和思考某些以经验为导向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乡愁所主张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或代表性。“阐释的乡愁”阶段,行动者试图以某种方式将他所感受到的乡愁情绪客观化,并分析乡愁情绪所导向的问题,如乡愁情绪的来源、典型特征、意义和心理目的。他强调,两种更高阶段的乡愁并不必然代表着“更好”,“自反”和“阐释”包含比“简朴”更复杂的认知视角,但是与此同时它们的复杂性也导致了某种混乱。<sup>③</sup>乡愁是一代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每一代都提醒着另一代“珍贵的东西”即将失去或被遗忘。<sup>④</sup>他区分了“集体的乡愁”和“个人的乡愁”。“集体的乡愁”指的是物体的符号具有高度公开、广泛共享和熟悉的特征,这些来自过去的象征性资源,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同时引发数百万人的一波又一波的乡愁之情。“个人的乡愁”指的是那些来自过去的象征意象和典故,由于它们的来源在一个特定的人的传记中,在它们的引用中往往更具有特质、个性化和特殊性。两者本质上都属于主观体验的范畴,因此,大多数人在主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每个层面上都有乡愁的象征材料的重叠、交织和嬗变,从而,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构想出一个相当紧密的象征性网络,将集体与个人的乡愁联系起来。<sup>⑤</sup>

詹姆森提出了“乡愁情绪”和“乡愁模式”之间的区别,认为前者是由失落感引起的,后者是一种不涉及个人记忆的消费风格。<sup>⑥</sup>博伊姆区分了旨在“对失去的家园的历史性重建”和“复原性”的乡愁以及那些意在反映“讽刺的和渴望的渴望本身”的“反思性”的乡愁。<sup>⑦</sup>帕拉则认为,乡愁之情不仅仅是对无法挽回的过去的逃避,或者政治上的非颠覆性,<sup>⑧</sup>乡愁之情既包括对当下的道德批判,也包

① O. Angé & D. Berliner, *Anthropology and Nostalgia*, Oxford: Berghahn Books, 2015, pp. 3 - 4.

② 参见[法]芭芭拉·卡森:《乡愁》,唐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③ 参见 F.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79, pp. 17 - 27.

④ 参见 F.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p. 115.

⑤ 参见 F.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pp. 122 - 124.

⑥ 参见 P. Grainge, *Monochrome Memories: Nostalgia and Style in Retro America*, Westport, CT: Praeger, 2002.

⑦ 参见 S.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p. xviii.

⑧ 参见 P. Rethmann, “Nostalgie à Moscou”, *Anthropologie et Sociétés*, Vol. 32, No. 1 - 2, 2008, pp. 85 - 102.

括应对社会变化的另一种选择。<sup>①</sup> 布莱恩特的民族志研究表明,乡愁构成了一种对理想化和刻板印象的自我形象之渴望,人们相信这种自我形象已经无可挽回地消失了。<sup>②</sup>

18 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四处寻找家园。”不难发现,当乡愁从临床内涵转向象征意义之后,不同学科对乡愁的释义尽管有不同的视角和话语,但已然呈现出明显的哲学表达和伦理蕴涵。具体而言,乡愁的哲学表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愁的主体,即所谓“谁在愁”?正如戴维斯所提出的集体的乡愁和个人的乡愁,乡愁的主体既可能是“数百万人”,甚至更为众多人数的群体,也可以是一个特定的个人。两者本质上都属于人的主观体验,集体的乡愁具有公开、共享的特征,个人的乡愁更具有个性化特质,两者又会通过一定的重叠、交织而相互联系和影响。二是乡愁的对象,即所谓“愁什么”?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提出“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sup>③</sup>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乡愁从哲学上将无家可归(homelessness)的形式赋予了疏离和异化的内容。尽管乡愁对象从开始临床内涵中确切的“故乡”转向象征意义中“故乡、家园、过去、传统”等意涵,但我们仍可从中发现乡愁对象的某种共同价值指向,即对某种当下并不拥有的“失去”之认同、留恋、渴望,即一种“渴望改变了的现在所缺少的东西……仅仅因为时间的不可逆转,而对现在无法实现的东西的向往”<sup>④</sup>。三是乡愁的根源,即所谓“为何愁”?依循德国哲学传统的图尔纳认为,“对于怀乡的人来说,世界是异己的”。<sup>⑤</sup> 因此,他主张从哲学和社会学上将乡愁当作“某种人类疏离(estrangement)的基本状况”<sup>⑥</sup>来讨论。滕尼斯认为,共同体(gemeinschaft)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理想类型,其形成需要成员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这“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和同情”<sup>⑦</sup>。他明确表达出对共同体中人们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怀有深厚感情。鲍曼更为直接地提出,共同体“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个我们热切希望重归其中的天堂”<sup>⑧</sup>。可见,在不同学者对乡愁的释义或相关表达中,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复原与重建、渴望与批判等,都呈现出乡愁根源的冲突性特质及其与乡愁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 二、文化乡愁:现代性的重要问题及其中国特色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两个既相关联又相区别的概念。尽管对这两个概念的界定有着众多的表述,但总体上看,“现代化”主要意指从不发达社会成为发达社会的过程和目标,其中包含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一系列可量化指标的变化;“现代性”则从哲学层面抽象出这一过程和本质的特征,侧重于反思其理念、意识和精神。美国学者罗伯森认为:“在当代阶段,一度被认为是现代性的一种标志的对自发性和个人自主性的怀旧,已经成为乡愁的突出维度。甚至当代社会科学中一些形式的个体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从它们企图使现代生活逆分化、使之减少到一

<sup>①</sup> 参见 A. Parla, “Remembering Across the Border: Postsocialist Nostalgia among Turkish Immigrants from Bulgaria”,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9, Vol. 36, No. 4, pp. 750 – 767; G. Yang,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2003, Vol. 9, No. 3, pp. 267 – 296.

<sup>②</sup> 参见 R. Bryant, “Writing the Catastrophe: Nostalgia and Its Histories in Cyprus”, *Journal of Greek Modern Studies*, Vol. 26, 2008, pp. 399 – 422.

<sup>③</sup>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郇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9 页。

<sup>④</sup> M. Pickering & E. Keightley, “The Modalities of Nostalgia”, *Current Sociology*, Vol. 54, No. 6, 2006, pp. 919 – 941.

<sup>⑤</sup> B. S. Turner, “A note on nostalg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4, No. 1, 1987, pp. 147 – 156.

<sup>⑥</sup> B. S. Turner, “A note on nostalgia”.

<sup>⑦</sup>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58 页。

<sup>⑧</sup> [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 页。

个维度这种意义上说,也应当归入怀旧一类。”<sup>①</sup>20世纪以来,日益加速的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引发了更多关于“文化乡愁”的讨论。所谓“文化乡愁”,“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随现代全球化平整运动而产生的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追忆情绪。它是‘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副产品,对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类来说,具有着‘家的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home)的性质”<sup>②</sup>。“文化乡愁”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一个伴随着不断增长的媒体文化和通过流行文化将乡愁商业化的巨大社会变革的时代。<sup>③</sup>进一步而言,要理解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乡愁及其中国表达,我们不妨从哲学层面回溯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和论争。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启蒙现代性是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现代性观念。启蒙现代性的理解基于启蒙所倡导的理性、自由、科学等基本价值及据此形成的理念和行动。在启蒙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相对前现代农业社会的阶段及与之对应的社会运行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更是一种指向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伦理诉求。“就现代性诞生以来的现实逻辑看,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态度和观念,一种与过去决裂,注重现在的时代意识的觉醒。这种态度、观念既包含对历史事实的陈述性反映(is),也具有价值判断和规范(should)的意味”<sup>④</sup>。不过,现代性在其展开的过程中,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日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扩张,导致种种现代性问题乃至“危机”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后现代性正是在对现代性的质疑与批判中形成的,后现代解构话语的流行又强化了对“现代性问题”和“作为问题的现代性”之反思。尽管这种反思并没有完全给出解决问题和危机的有效方案,但依然给我们提供了警醒和提示。

在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中,当今世界是一种多元现代性的世界,西方化不可能成为人们对现代性的唯一理解与构建途径。其提出者和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认为:“理解当代世界——实际上是解释现代性的历史——的最好方法,是将其视为文化方案多样性不断构建和重构的一个故事。”<sup>⑤</sup>基于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差异,现代性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发展路径,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性。另一位代表人物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强调现代文明的开放性。他提出:“多元现代性的世界将分享由不同的文化经验所贡献的规范性标准。这将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或孤立的民族—国家的世界,而是一个开放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各样成为现代的方式能够找到共性,这些共性能够创造性地相互作用,并将自身理解为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sup>⑥</sup>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口规模、资源禀赋、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各不相同,其现代性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样式。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而且应当以自己独特的道路和模式作为现代性的具体呈现。

在关于现代性的诸多争议之中,怀旧、乡愁成为与之密切关联的一个问题。20世纪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遭遇的同质化倾向,是导致文化乡愁成为现代性主要特征之一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乡愁更多体现为对某种当下无法拥有的“失去”——故乡、家园、传统等——的留恋、思念、认同及渴望,那么,现代性视野中的文化乡愁具有更加复杂的表征。基于启蒙现代性的乡愁往往是反传统的,表现为对故乡(或传统)的“不变”产生的忧虑和惋惜。而在后现代对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以及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中,基于对传统的留恋而形成的“复原性乡愁”、基于对同质化的批判而

①[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

②万俊人:《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论》,《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③参见F. Davis,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P. Grainge, *Monochrome Memories: Nostalgia and Style in Retro America*; F.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④沈湘平:《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与哲学的现代性境遇》,《光明日报》2006年9月25日,第12版。

⑤[以]S. N.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7页。

⑥[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概念及其潜力》,载[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任斯·理德尔、[以]S. N. 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6页。

形成的“重建性乡愁”，都成为现代性乡愁的重要特征。正如麦克坎内尔曾写道：“现代性最终战胜其他社会文化安排的最佳迹象，不是非现代世界的消失，而是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为保存与重建。”<sup>①</sup>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对民间音乐和医术、装饰和行为、农民衣着的崇拜”。<sup>②</sup>由此，现代性赋予乡愁的内在冲突与张力，使当下的文化乡愁表现出矛盾、困顿、焦虑的内涵和表征。在全球化背景中，也出现了一种更为宽泛意义上的、反本质的后现代乡愁观，认为“乡愁的对象并不一定是具体而微的家乡，而应该突破地理空间界限，蔓延至更广远的地方、更广远的时代：童年、梦幻、田园的诗意或更为缓慢的生活节奏”<sup>③</sup>。

较之西方医学、心理学及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话语体系中的“乡愁”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乡愁这一语词在中国话语中更多体现在文学表达上，“至少从公元前6世纪孔子时代开始，‘怀旧’这一术语——‘乡愁’——在中国文学中就一直是一个突出主题”<sup>④</sup>。这一主题在众多直接抒发思乡与怀旧之情的作品中贯穿，并以“离骚”“别赋”“田园诗”等形式呈现。因此，乡愁往往与“感伤”“失落”“孤独”“惆怅”等情绪相联系。“乡愁”作为一个词语较早出现在唐代诗词中，岑参在《宿关西客舍寄东山严、许二山人时天宝初七月初三日在内学见有高道举征》中以“孤灯然客梦，寒杵捣乡愁”表达自己思乡的愁闷。在现当代文学中，乡愁以“乡土文学”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方式。乡土文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的《故乡》《祝福》为代表，以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股潮流。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全球化的潮流，乡愁书写更成为当代文学中最为突出的主题。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乡愁》一诗，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具体物象赋予乡愁丰富的内涵，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乡愁文学作品。此后，“乡土小说”“寻根文学”“返乡体文学”等乡愁文学的表达形式不断丰富，也为乡愁注入了更多浪漫的文学想象和田园情怀。也正是由于乡愁的中文表达不同于西方话语而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底蕴，国内一些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将“xiangchou”作为关键词“乡愁”的英文译词。<sup>⑤</sup>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表述，进一步拓展了理论和实践层面关于乡愁的探讨，乡愁成为国内学术界众多不同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成为探讨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乡村与城市关系及农民观念与心理等诸多问题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应当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一进程中，乡村与城市关系的变化既呈现出普遍性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突出体现在乡村与城市关系和中国农民的身份转变，以及由此生成的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特有的道德图景。19世纪初期，中国对社会进化论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进步、乡村落后”的话语构建，“工业主义催生出来的现代大都市，却颠倒了农业乡村的主宰地位，它们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并且依附于都市自身。都市不仅成为权力和经济的中心，而且还在一步步地引导和吞噬乡村的生活方式。乡村反过来成为现代都市的一个象征性的乡愁之所”<sup>⑥</sup>。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使这一话语表现为经济方式上“工业经济优于农业经济”、生活方式上“城市生活优于农村生活”、文化方式上“城市文化优于乡村文化”和社会群体上“城里人优于乡下人”的价值排序及其不断强化。“农民”不是职业群体而成为一种被固化的身份。对于改变职业角色的农民而言，无论是获得城市户籍而完成了身份转变的“新市民”，还是进入工厂务工甚至长期在城市生活但依然保留农村户籍的“农民工”，

①D. Mac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8.

②Ibid.

③卢建红：《乡愁与认同：现代中国作家的故乡书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236页。

④[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第215页。

⑤参见陆邵明：《乡愁的时空意象及其对城镇人文复兴的启示》，《现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8期。

⑥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上），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编者前言”第10页。

在“回不去”的家乡和“融不进”的城市之间,乡愁既是由情感和理性的疏离而产生的困顿,又是治愈紧张、孤独、焦虑、易变等“城市现代病”的良药。无论是认同、留恋还是疏离、抗拒,乡村仍然是他们的生活之“根”和文化之“根”。“乡愁朝向的是本真、整体性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家园,是一种美好生活与幸福的状况,即好的存在状态(well being)。”<sup>①</sup>根植于乡村生活尤其是乡村人际关系、空间载体和道德生活记忆的乡愁,不仅包含了恋土、怀旧、思乡的复杂情感,还兼具理想追求、身份认同、精神寄托等价值诉求和伦理意义,成为一种隐喻着城乡关系和农民身份认同的“现代性的中国话语”<sup>②</sup>。

### 三、“记住乡愁”: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伦理“还乡”

乡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梁漱溟曾指出,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伦理“在场”社会,传统村庄有着显著的伦理共同体特征。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偏好、惯习和记忆,构成乡村共同体的伦理基础;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礼治秩序和道德权威力量,形成乡村共同体的伦理特征;以“人情”交往为表征的经济逻辑与道德逻辑的统一,呈现乡村共同体的伦理意义。乡村工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及其所产生的人口流动和身份变化,削弱了村庄成员惯习和记忆的“共同性”,冲击了传统家庭和族群的道德教化力量,也降低了村庄成员对村庄共同体的物质和精神依赖。从这一意义上说,乡村共同体的伦理特征和价值意义走向式微,这也是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众多问题的伦理根源。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伦理“还乡”之“还”,不是从外部的强行进入或给予,而是原本之“在场”的复归。

应当看到,强调伦理“还乡”的价值意义,并不足以在理论层面获得“伦理可以还乡”的充分论证,更无法在实践层面获得“伦理何以还乡”的操作路径。2013年中央城镇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留住乡愁记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说,“新农村建设”开始关注乡村生态环境和村容整洁,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则是通过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系统推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记住乡愁”既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之“根”,也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了理想追求、精神家园等伦理意义。换言之,“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体现的是物质、生态层面的乡村之“美”,而“记得住乡愁”体现的是乡村伦理关系、伦理精神和伦理生活所指向的乡村之“好”,二者共同构成乡村“美好生活”。

如果说“记住乡愁”充分彰显了乡村振兴背景中伦理“还乡”的价值旨归,那么,伦理“还乡”需要通过乡愁实践的伦理“嵌入”,为“记住乡愁”提供有效的实践路径。具体而言,“记住乡愁”的实践推进需要从主体、对象和根源即“谁记”“记什么”和“如何记”三个方面切入,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中伦理“还乡”的可能路径。

首先,正如前文述及,乡愁的主体既可能是群体也可以是特定个人,两者又会相互联系和影响。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记住乡愁”的主体既有乡愁主体自身的特征,又呈现出现代性的伦理冲突和矛盾,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中伦理“还乡”的主体要求。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体上说,农民都是乡村的主体。中国传统乡村共同体依靠各种成文或不成文形式存在的村规民约对村庄共同体成员形成了道德约束力,在这一礼治秩序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中,无论是村规民约的制定、实施,还是其道德教化功能的发挥,都始终是以居于其中的村庄成员为主体。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强化了

<sup>①</sup>沈湘平:《乡愁的过去与现在》,沈湘平、常书红主编:《都市与乡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55—56页。

<sup>②</sup>王露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振兴与伦理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

村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同质化,也削弱了村规民约的作用及村民在村庄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流动性和异质性进一步增强,与村庄其他成员的联系度下降,作为村庄成员的主体意识趋于薄弱。应当看到,乡村发展始终应当且必须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性,“记住乡愁”不是使乡愁成为对农民进行救赎的给予,而是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主动探寻“记住乡愁”的路径,成为传播乡愁记忆的主体。在中国不同区域村庄的田野调查中<sup>①</sup>,我们发现,近年来以种种“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广形式进行的“送书下乡”“送戏(电影)下乡”等文化活动,农民参与度低,收效甚微。相反,“乡村春晚”“乡村歌会”“乡村故事会”“乡村饮食节”等农民自创自办的文化形式,充分激发了基层村民的主体活力和文化热情,参与度高,对村庄文化元素的保留和村民认同意识、凝聚意识的提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效应,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路径。

其次,“记住乡愁”的对象,是主体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记忆,尤其是当下难以获得或拥有的道德记忆。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这种共同记忆一般基于共同的物质载体、公共平台和风俗惯习。传统村庄共同体是一个“面对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村庄成员有着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偏好和惯习,无论是劳作方式、饮食风味,还是居住环境、交流形式等,都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尤其重要的是,传统村庄在稳定而日常化的道德生活形态中生成了日常化的公共道德平台,在田间空地、井口河边、祠堂戏台,村庄成员通过“张家长、李家短”的道德评价和传播,形成并强化共同的道德认同和内部凝聚。由此,人们从孩提时代就在这种日常化的道德传承和道德教化中形成关于乡村道德生活的共同记忆,并生成某些特定的“地方性道德知识”。伴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提高,自来水、家用电器、电脑、手机的普遍使用减少了人们对原有公共平台的使用,传统村庄的公共道德平台日渐式微,也削弱了村庄成员共同道德记忆产生的基础。无论是已经离开乡村居住于城市中的“新市民”,还是仍然生活于乡村的村民,都会对这种共同记忆保有长久的记忆和深切的怀念。这也提醒我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中,通过重建既体现“地方性道德知识”又与当前乡村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相契合的公共道德平台,为村庄成员形成共同的道德记忆提供有效的空间和载体,是“记住乡愁”从而实现伦理“还乡”的有效操作路径。

最后,如何“记住乡愁”的关键,是始终把握乡愁根源的冲突性特征,并保持其在传统与现代、过去与将来之间的张力结构。乡愁的多学科阐释始终呈现出乡愁根源的冲突性特质及其与乡愁主体间的紧张,在现实层面,表现为乡愁主体既有对家乡美好生活或其某种表征的怀念,又有因某些对立的原因而不能归乡的愁绪。在田野工作中,我们发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农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校园直接进入城市并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对农业生产活动缺乏经验性认识,也难以产生将村庄作为自己“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相反,他们对城市生活尤其是职业发展的可能性有着更强的渴望和向往,也期待城市生活的现代元素进入乡村。对于他们而言,乡愁似乎更多体现为现代性视野中对故乡停滞、不变的担忧和批判。另一方面,无论是生于乡村并已经落户于城市的“新市民”,还是依然保留农村户籍的“农民工”,他们与城市生活始终存在一定的疏离感,对乡村人际交往、饮食风味、生活习俗有着深刻的道德记忆和情感依恋。尤其在春节、清明、中秋

---

<sup>①</sup>2007年以来,笔者带领团队对江苏省无锡市华宏村(2007年初访,2017年再访)和苏州市圣牛村(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扁担赵村(2012年)、贵州省凯里市朗利村(2012年)、湖南省郴州市西岭村(2017年)、湖北省黄冈市赵家湾村(2017年)、甘肃省定西市辘轳村(2017年)、江西省抚州市下聂村(2017年)、山东省济宁市王杰村(2018年)、广东省湛江市林屋村(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黄田村(2022年)、云南省曲靖市江边村(2022年)、天津市静海区吕官屯村(2022年)、山西省太原市西蒲村(2022年)、浙江省温州市后桥村(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林家圪堵村(2022年)进行了田野调查。所有村庄的田野调查均采用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问卷调查使用多阶段系统抽样方法,结果采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汇总分析。同时,在每个村庄,笔者与课题组成员按照兼顾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的原则,分别选取10名左右的访谈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此外,笔者还带领团队对浙江丽水的“乡村春晚”、江苏徐州马庄村的基层文化建设进行了专项调研。

等重要节日,即便要付出极高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他们依然会千方百计地加入“返乡大军”。从这一意义上说,乡愁又体现为回归家园的强烈愿景和行动,是主体摆脱现代性焦虑的工具。应当看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非要达到“工业取代农业”“城市取代乡村”“市民取代农民”的目标,而是要实现农业的全面升级、农村的全面进步、农民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革,这必然引发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变化。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伦理“还乡”,不是试图返回传统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式,也不是希冀将现代性的伦理话语或城市文化放置于乡村,而是以“还乡”的姿态实现乡村伦理的现代重建。在这一背景中,“记住乡愁”不是一味地保留或回归乡愁主体原本生活、记忆中的乡村,不是以商业化的“旧时光、老地方”呈现的乡村旅游景观和乡愁消费,也不是在乡村成为城市的复制品之后寻求某种精神慰藉,而是保持乡愁主体在“离乡”与“还乡”间的张力,通过乡村自然景观、建筑格局、劳作场景、生活氛围、乡土故事、饮食风味、节庆风俗等多种乡愁元素的嵌入,获得空间意义和精神意义上“家”的归属感,从而使“记住乡愁”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伦理重建的道德文化之“根”。

(责任编辑:张 升)

## How to Bring Ethics Back to the Rural Areas: A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Nostalgia

WANG Lulu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expression of the nostalgia mainly reflects the subject, the object, and the source of nostalgia. In the interpretations or related descriptions of nostalgia by different scholars, their discourses on the tension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longing and criticism, etc., all present the conflicting qualities of the root of nostalgia and its conflict with the subject of nostalgia.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homogenization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cultural nostalgia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Nostalgia, which is rooted in rural life, especially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spatial carriers, and moral life memories, contains complex emotions of love for the land and homesickness, and has value demands and ethical meanings such as personal aspirations, identity, and spiritual reliance, thus becoming a “Chinese language of modernity” that metaphorically represents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the peasant identity. “Remembering nostalgia” fully manifests the value of the ethical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ethical “returning” requires the ethical “embedding” of nostalgia practice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practical path for “remembering nostalgia”.

**Keywords:** nostalgia; ethical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remembering nostalgia; rural revitalization

**About the author:** WANG Lulu,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23).